

## 中译本序言

### (一)

李嘉图是英国产业革命时代，代表着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是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在英国是由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的。

李嘉图生活在 1772 年至 1823 年的英国。他所处的时代，是英国的产业革命正在进行，产业资本正在为自己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并继续同旧的经济残余与政治势力进行斗争，为自己的发展扫清道路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矛盾与阶级斗争虽已发展但尚未十分尖锐的时代。

产业革命的巨大意义，就在于它以工作机为核心的大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跃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产业资本的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使资本主义的生产由工场手工业阶段过渡到了机器工业的阶段，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一切旧的生产方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经济学家李嘉图，由于他处在那样一个资本主义进步的、发展的时代，也由于他对科学的真诚，因此就能够对科学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无顾虑地作出了自己的总结，将古典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推向了最高峰；另一方面，也由于其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限制，就不可避免地要在理论上留下了不少的破绽、错误，甚至

庸俗的因素。

李嘉图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时间并不长，留下的著作也不算多，但其学术水平却超过了以往任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本书，就是其经济思想的集中表现。这本书的重新出版，对于我们了解李嘉图的，以至资产阶级的经济学，都是必要的。帮助我们理解这本书的最好老师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学说史》。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将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当作研究重点，用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作了十分详细、系统、全面的科学评论。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宝贵的启示。

李嘉图这部划时代的科学名著，初版于1817年，最后修订（第三版）于1821年。全书共分三十二章。但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的全部理论已经包括在前六章中了，在前六章中，基本的原理部分又集中在头两章，无论独创性，根本见解的统一性、集中性、深刻、新奇以及有含蓄的简洁，这两章都给了我们理论上的满足，第七章以后的各章，就只是前六章的复述、说明、应用与补充，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了。

李嘉图的经济学说，是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并力图发展生产力，扩大生产的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因此，它的历史使命，就是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如何比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更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更能使财富增加。这样的理论，对于当时的社会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判断某种经济学说的历史意义与科学价值，首先就要看这种学说，是否曾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揭示了经济运动中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从而推动了科学的前进。其所起的作用愈大，其科

学的价值也愈大。

读过李嘉图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他是热爱生产力发展的,通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来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贯穿于李嘉图著作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李嘉图懂得,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前提。他认为应该不惜一切地为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财富的增加创造条件。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虽然是为了追求利润的,但利润又是为了积累,为了发展生产力的,而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又是为了满足人们需要的。因此,资本主义的利益同生产力发展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自然的生产方式。

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李嘉图的这种看法是有其一定的历史理由的。他在经济学上的成就与贡献,缺点与错误都是由此而生的。马克思曾指出,“李嘉图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当作生产一般的最有利的方法,当作财富生产的最有利的方法。这种看法,对于他的时代,是正确的。他冀求为生产的生产。这是正当的。……如果李嘉图的见解大体上合于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那只是因为(并以此为限)他们的利益,和生产的或人类劳动生产的发展的利益相一致。”<sup>①</sup>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才使李嘉图无顾虑地、诚恳地、坦率地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放在其它一切阶级利益之上,坚决地为工业资本家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与积累而申辩。他认为,只要能够增加工业家的利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是牺牲土地占有者的利益,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也都是应该的。但另

<sup>①</sup> 参阅《剩余价值学说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296—297页。

一方面,又由于这种非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使他陷入了资产阶级狭隘利益的偏见之中,不能更加深入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其运动的本质,看不清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基本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过渡性,因而在理论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 (二)

李嘉图在经济科学上的主要功绩,是他作为古典派经济学的完成者,对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原理作了比较透彻的表述与发展,奠定了劳动价值学说的初步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之上着重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分配问题,发现了工人、资本家、土地占有者之间经济利益上的对立,从而初步找到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

劳动价值论,由威廉·配第所创立,接着由富兰克林对其作了最早的、有意识的详细说明。但在重农学派的眼中,创造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劳动只限于农业劳动,到亚当·斯密手中,才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将创造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劳动普遍化,认为工业劳动也一样是创造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劳动。并且他还将劳动决定价值的规律同整个的经济学说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劳动价值论。但亚当·斯密在价值决定问题上还是摇摆不定的。他虽然在实际上是经常运用商品内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交换价值这一正确原理来展开其研究工作的,但同时又认为这一原理只适用于过去的时代,而资本主义的商品价值,却是由这种商品所能购买到的商品量或活劳动量所决定。由于劳动的价值等于工资的价值,因此,所谓由所购买的活劳动量决定,也就是由工资所决定。沿着这一错误

的路线发展下去,又从生产的领域跳到了分配的领域,提出了由各种所得构成价值的观点。亚当·斯密的这种观点,曾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给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很大的影响。

与亚当·斯密相反,李嘉图肯定说,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唯一基础,商品价值的大小由其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决定。并且,指明劳动决定价值的规律,不仅适用于过去,而且也支配着表面上与它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在这种科学面前,高声喊了一声立正:资产阶级体系的生理学即其内部有机关联和生活过程的理解之基础或出发点,是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李嘉图即由此出发,要使这种科学放弃它以前的老套,并要在这上面,清算一下别一些由它展开并且说明的范畴——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在什么程度以内,与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相照应或矛盾,……这是李嘉图对于这种科学所有的伟大的历史意义;……”<sup>①</sup>

亚当·斯密,看到了在生产中,劳动者的工资同他的生产物价值不相等,看到了当作资本,一个商品的价值增殖,不是比例于它里面的劳动,而是比例于它支配的别人的劳动。因此,他就主张,在资本主义开始以后,商品的价值就不再是由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来决定,而是由它所能购得的或支配的活劳动来决定。

李嘉图正确地指责了亚当·斯密的这种混乱,说明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量,和这一商品所能支配的活劳动量或劳动报酬是不相等的。商品中包含有多少劳动,和这种劳动有多少归劳动者自己是沒有关系的,后者的变动并不影响前者;并且,既然承认商品中所含的劳动,在工资成立以前,已经是价值的尺度,就沒有理

<sup>①</sup> 参阅《剩余价值学说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5—6页。

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

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以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

或价格,只不过是劳动力价值的一种转化形态或现象形态,而劳动力的价值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也是由生产它自身所必要的劳动量所决定的。因此,在以剥削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内的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仍然是适用的。

在价值的形成上,李嘉图还正确地指出了,“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投在商品内的劳动,投在工具、建筑物内的劳动,亦有此种作用。”按照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在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之中,不仅有创造新价值的活劳动,而且有包含于生产资料中的物化劳动。生产资料的价值是会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但在李嘉图的公式中,未曾包括原材料中的劳动却是一个缺陷。

在价值决定的问题上,李嘉图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价值量上去了,而没有能够再深入一步,去研究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的特殊性质,没有能够了解与掌握劳动二重性这一个理解商品经济,以至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枢纽点。因此,也就不能够说明价值的实体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当然更不可能了解,在同一次的生产过程中,两种不同劳动在价值形成上的不同作用: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转移着包含于生产资料中的价值,抽象的社会的劳动创造着价值。

对于价值量的分析,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中,李嘉图算是最好的。但因他不了解劳动量的区别,是以质的同一性,即以抽象劳动为前提的,因此,他的分析仍然是不充分的。他指出农业中的商品价值量是由最不利条件下的必要劳动消耗量来决定是有道理的,但是认为包括工业品在内的一切商品价值量都由最不利的条件下的劳动消耗量所决定就不正确了。对价值量的科学而详细的说明,仍然要归功于马克思。马克思告诉我们,商品价值量表现

一种必然的,内在于该商品形成过程中的,对于社会劳动时间的关系。只有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一个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一个商品的价值与实现其内的劳动量成正比例,与实现其内的劳动生产力成反比例。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社会标准的生产条件下,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与劳动强度,生产任何一个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对于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完全未被李嘉图所注意。正如马克思所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是从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成功地发现那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态。甚至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好代表,也把价值形态当作毫无关系,和商品本身的性质没有什么联系的东西来看。他们会如此看,不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已经完全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还有更为深刻的理由。劳动产品的价值形态,不仅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形态,并且也是它的最一般的形态。它把这个生产方式当作一种特别的社会生产而加上印记,同时还使它取得历史的特征。如果人们错误地把这种生产方式看作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人们就必然会把价值形态的独特性忽视掉,因此也把商品形态的独特性,把更进一步发展的货币形态,资本形态等等的独特性都忽视掉。”<sup>①</sup>

由于他只注意到价值量的分析,而忽略了价值实体与价值形式的研究,也就自然混淆了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在他的这本书中,一开始就把价值叫做交换价值。他所说的价值,有时是

<sup>①</sup> 参阅《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卷,第1章注32。



指由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有时是指表现在别一个使用价值上的交换价值。前者他又叫绝对价值、真实价值或价值一般，后者又叫比较价值或相对价值。但他对二者的区别是不清楚，不一贯的。他没有说明决定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不同因素，并且在研究的过程中又常常忘记了价值或绝对价值，而固执于相对价值或比较价值。在他看来，只有相对价值才是值得重视的。他既已忽略了价值形式的研究，就自然不可能认识到货币的来源与本质，不可能了解货币的各种主要职能，特别是不了解货币的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而为他以后的研究带来了困难。

### (三)

对于资本的本质，李嘉图是全然不了解的。在他看来，资本只是积蓄的劳动，只是劳动过程中的一个物质要素。资本和生产资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原始人所使用的工具也是资本。资本，在他的头脑中只是一个自然的，永恒的范畴。他不了解资本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只有在它被用来支配与剥削雇佣劳动者的时候才变成资本。他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非历史的观点。他以这种观点来看资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资本的社会本质及其作用，不能全面地正确地说明工资与利润之间、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对于剩余价值，李嘉图从来没有离开其特殊形式进行研究。但他在研究工资与利润的关系时，把资本全部当作了可变资本，因此，实际上他是在利润的名义下研究了剩余价值的。不过要注意，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剩余价值与利润是混杂在一起的。有时他把

剩余价值规律当作利润规律来讲，有时又把利润规律直接地无任何中项地当作剩余价值规律来叙述。

在他的研究中，能够把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和资本流通时间的差别，以及一切由流通时间的不等，从而由资本流通时间和再生产时间引起的差别，总括起来进行考察，确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他考察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等量资本在不同部门中，以不同的比例分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时，对价值规律有怎样的影响，工资的变动，又怎样影响于价格。他的方法是先为投资于不同部门的等量资本，假设了平均利润，然后就来回答，在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以不同比例加入时，工资的涨落会怎样影响于相对价值。

其实，剩余价值问题，只能就它与可变资本的关系来考察。但李嘉图是不了解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这些范畴的。因此，他也就未能对以直接生产过程为基础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区别进行考察，而只考察了比较次要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并且将这种区别同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别混淆起来。因而他也就混同了利润与剩余价值的区别，进而混同了生产价格与价值的区别，为利润率的规律和地租的规律定下了错误的前提。

利润与剩余价值、生产价格与价值，只有在资本全部为可变资本的条件下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但这样的条件是根本不存在的。为了进行生产，资本就必须分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反映技术构成的资本价值构成（即不变资本价值与可变资本价值）就是资本的有机构成。只要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利润与剩余价值、生产价格与价值就不会一致。由价值到生产价格，是必须通过一系列的

中间环节才能说明的。为此，必须了解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的消耗表现为资本的消耗，资本又分为本质上不同的部分发生作用，以及利润率平均化等问题。但这些问题，正是李嘉图所不了解的。

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上，李嘉图看到了生产物的价值大于工资的价值，看到了工人所创造的价值，大于他以工资形式所得到的价值。但由于他没有将工资与剩余价值归结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同时又将劳动日当作一个固定量来看待，因此，他就不可能弄清剩余价值的来源与本质，也不可能看到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日对工人所进行的剥削，以及工人阶级为标准劳动日而进行的斗争等问题也被忽略了。

在劳动日延长或劳动者人数增加时，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是可以同时增加的，一方面的增加，并不必一定以别一方面的减少为条件。因此，李嘉图所说的工资与利润（剩余价值）只能以反比例的方向发生变动的规律，其适用是有条件的。

李嘉图在剩余价值生产问题上的主要贡献是他大体上说明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他指明，工资的涨落会在剩余价值方面引起相反的变动。工资的相对高度是由工人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由劳动生产力所决定。因此，一切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会压低工资，提高剩余价值。

由于李嘉图学派不了解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并且混同了生产价格与价值，就使他们的劳动价值论陷入了绝境。

第一，他们没有办法解释劳动决定价值的规律同商品价值和劳动价值循环决定之间的矛盾。

第二，他们没有办法解释劳动决定价值的规律同使用活的劳

动不等的等量资本可以获得相等利润之间的矛盾。

只有马克思,才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完全科学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从而使劳动价值论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为彻底解剖资本主义经济,奠定了基础。

#### (四)

从李嘉图为本书写的前言中可以看出,他是把资本主义的分配问题,当作经济学上的主要问题来看待的。过分的强调分配问题,虽然不对,但其对分配问题的研究还是有显著成就的。

李嘉图在分配问题上的主要贡献,首先表现在他的分配论是以其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同时又通过对分配,特别是地租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劳动价值论。

在他的分配论中一贯地坚持了这样的思想:劳动者在生产中所创造的价值,是各种所得的唯一源泉。生产物的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地租等所得的情况,并不能动摇生产中所消耗的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量这一原理的正确性。

从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各种所得的来源这一前提出发,他又进一步指明了,工资等于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利润等于商品价值超过工资的余额,地租是商品价值超过工资和利润的余额。这样的分析,就在实际上承认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所得,都是由工人创造的,资本家、地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当然,在李嘉图的心目中,是把这样的关系当作自然的,合理的,永恒的关系来看待的。

在分配论上的另一个功绩,是他从分配的角度,揭露了资本主

义社会中三大阶级之间的矛盾，为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提供了理论根据。他认为在分配方面，最重要的是各阶级所得的比例关系。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关系是互相对立的关系。工资与利润的变化是成反比例的，工资增加，利润就会减少。地租同利润的变化也是反比例的。地租的提高，会影响到货币工资的提高，进而使利润下降。对分配关系的这种分析，就把工人、资本家与土地占有者这三大阶级摆在了对立的地位，指出了他们在经济利害上的矛盾。不用说，在这些矛盾的对立之中，李嘉图是公开站在资本家方面的，其斗争的锋芒首先是针对着地主阶级的。他力图证明，地主的存在，地租的增加，不仅会使利润减少，而且会影响资本家的积累兴趣，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地主的利益不仅同资本家的利益相矛盾，而且同整个社会的利益相矛盾。在这里，为了坚持劳动价值论，他不得不说明利润与工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立，但这样说明的主要目的之一，又是为了通过工资这个中间环节来说明地主与资本家的对立的。因为在他看来，地租的提高是通过货币工资的增加来使利润降低，而妨碍到资本家的利益的。

在工资方面的一个最大贡献，是他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相对工资，创造性地从社会关系的观点，说明了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不是由工资的绝对数量决定，而是由相对数量来决定。

在工资与价值的关系上，他的说明，也是比较好的。他认为，如果商品生产上所必要的劳动未变时，工资的提高，只能影响到利润的下降，但不会影响到商品价值的变动。这样的说明，就打破了流行已久的，工资提高必然会引起商品价格提高的错误论调。

李嘉图的分配论，虽然有不少科学的成分，但由于他没有将生

产放在首要地位，没有全面掌握生产决定分配这一原理，由于他把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当作了自然的、永恒的范畴，只注意到了分配的数量与分配的关系，因此，他就不可能完全科学地说明分配问题的本质及其规律。即使在他所研究过的问题中，也有着不少的错误与缺陷。

李嘉图关于工人的实际工资必然等于其必要生活资料的观点，一方面打破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生活可以不断改善的幻想；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否认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因素。实际上，由于大量失业工人的存在与竞争等等，工人的工资往往是低于其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工人的生活是经常处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状态之中的。更其错误的是他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与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当作了实际工资不变论的前提。这样一来，就掩盖了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生活日益贫困的真正的社会原因。

对于工人阶级的生活，李嘉图是冷酷无情，漠不关心的。他既看不到工人为了提高工资而进行斗争的意义，又反对对工人的任何救济。他虽然也看到工人的失业与生活的困难，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为了社会的进步所不可避免的。

在利润问题上，他虽看到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并不是从资本的有机构成逐步提高，可变资本相对减少这一正确前提出发，而是从土地收益递减，生产愈来愈困难的错误前提引申出来的。同时，他又没有分清楚利润与利润率的区别，不了解在利润率减低的情况下，随着资本总量的迅速增加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利润总额

还是在迅速增加的。不了解与利润率下降因素发生作用的同时，还有不少提高利润率的因素在发生作用。

### (五)

关于地租问题，需要特别谈一下。因为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是把它当作解决整个分配问题，以至价值论的关键问题来研究的。

李嘉图的地租论，实际上是在安特生所创立的级差地租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安特生提出了不是土地的地租决定生产物价格，而是生产物价格决定地租的论点，从而否定了重农学派所主张的，地租来源于土地特别肥沃性的自然恩赐论。亚当·斯密除了有时回到重农学派的见解不说外，进一步将地租看作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李嘉图接受了他们的正确见解，进一步发展了级差地租论。

李嘉图在地租论上的主要贡献之一，是他有意识地将地租理论同劳动决定价值的规律联系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种联系。从本书第二章的开首，就可以看出，他的地租论分明是以其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并且又回头来证明劳动决定价值的正确性的。他说：“尚待讨论的是，土地的占有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地租，能不能不涉及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而造成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为了了解本问题的这一部分，我们必须研究地租的性质和规定地租涨落的法则。”

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地租的分析上，最主要的困难，是说明农业利润何以会超过一般的平均利润，而产生超额利润；土地所有权又如何能从农业资本家手中，将这一部分超额利润夺去。从本

书中可以看出,李嘉图的地租论是在一个片面的,不彻底的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的。

他从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出发,认为地租来源于农业中的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是在土地有限,需要大于供给的条件下,由于优等地与中地上的农产品价格大于由劣等地条件所决定的社会价值而产生,并固定在农业中的。农产品是按照价值出售的。决定价值的劣等地没有超额利润,当然也就不会有地租。地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这种增加是由于好地有限,需要增加,资本必然由优等地依次转向劣等地,从而使生产更加困难,劳动消耗增加,价值增大而引起的。

他又从地租增加的规律中,进一步引申出了地主的经济利益同资本家,以至全社会人民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从地主的立场出发,希望农业生产更加困难,以便使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从而取得更多的地租。从工业资本家的立场出发,则希望农业生产力提高,使农产品价格降低,以便降低工资,增加利润。如是工业资本家着想,他就极力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力,并且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反对奖励谷物输出与限制谷物输入的政策。

由此看来,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是为工业资本服务,而反对地主阶级的。这种理论,在解除土地私有对生产力的束缚,在为工业资本的发展开辟道路方面,是有其巨大的历史意义的。

另一方面,还需要看到,在李嘉图的地租论中,是有着不少的错误与缺点的。第一,是他事实上承认了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并将由优等地依次转向劣等地当作了级差地租存在的前提条件。第二,是他错误地否认了绝对地租的存在。



李嘉图所以会犯这样的错误，从历史方面看，是由于他的地租论，是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年的。这个时期的英国，农业已经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求进行了巨大的改造，在一定限度内，土地所有权是不存在的。在国外，又有许多殖民地的处女地，加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中来，这些处女地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没有所有权的。在当时的英国，资本的积累也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并且可以在各部门自由转移，成为问题的主要是投资的场所。同时，在这个时期，小麦的价格是在不断上涨。因此，注意联系实际的李嘉图，就认为投资于农业的资本是不成问题的，同时也没有土地所有权当作土地上自由投资的障碍，认为他所发现的地租规律，同农业生产力的降低，同农产品价格的昂贵是有必然联系的。因此，他就“特别强调了如下的事实：即，得自由发生作用的地租法则，在一个确定的领土之内，一定会使人们去利用更不丰沃的土地，从而，使农业生产物昂贵，地租遂以工业及人口大众为牺牲而增加起来。”<sup>①</sup>

其实，不仅由优等地依次转向劣等地投资不是普通的规律，而且级差地租的确立，是完全不必以由好地转向坏地为前提的。重要的问题在于丰度的差别。由好地转向劣地，或由劣地转向好地，都可能发生级差地租。是向上，还是向下，那是一个历史问题，和级差地租的本质及其存在，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将级差地租同土地收益递减规律联系起来，就更其错误了。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不仅同级差地租无关，而且它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农业的投资一般是以技术与生产力的提高为根本条

① 《剩余价值学说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335页。